

执 政 党 视 國 下 党 的 意識形態建構研究



視國下党的

意识形态建构研究

程洪宝
著

程洪宝

著

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包括
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传播和认同三个基本环节。

新华出版社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执政党视域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研究/程洪宝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166-2425-8

I. ①执… II. ①程… III. ①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研究 IV. ①D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3248 号

执政党视域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研究

作 者：程洪宝

责任编辑：张 程 雉 悅

封面设计：燕清创意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市宣武广内印刷厂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开 本：16

印 张：16

字 数：21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201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2425-8

定 价：40.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序

程洪宝的博士论文《执政党视域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研究》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作为其博士阶段的导师，我为他由衷感到高兴！洪宝求学时勤于读书、喜欢思考、为人谦逊，属于我喜欢的学生。其论文选题是我建议的。利用这个机会，谈点我对这个选题的看法。

在 2014 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这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前提是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这需要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抓好意识形态的建构，传播和认同等各个环节。这其中，意识形态的建构问题，无疑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基础。

对于意识形态建设问题，葛兰西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他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指一定历史集团在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精神的、道德上的领导权，它通过“非暴力”的形式使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世界观被被统治阶级所信仰，体现为一种“同意”或“赞同”。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思考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具有重要启示。中国共产党要在执政条件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党的意识形态必须在和其他意识形态的比较中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从而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这就要求，其一，理论体系本身必须合理且合逻辑；其二，意识形态必须广泛有效地传播；其三，政治实践与理论内容相一致。其中，建构具有理性权威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是实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根本前提。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形式上体现为一种吸引力，在本质上体现为人民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支持。

党的意识形态要被人民群众认同，其理论体系本身就要有理性权威。党的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是其自身所具有的以其合理性与合逻辑性使人民群众信服的理论感召力，因此这种理性权威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理论自身的说服力，如价值取向的感召力、目标体系的合理性、为实现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所选择路径的科学性等。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要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践剖析，以为当代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借鉴。

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建构问题之所以如此紧迫地需要加以解决，就是因为时代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和新挑战，需要我们党通过意识形态建构对此做出回应和解答。这些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话语体系的渗透削弱党的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改革开放以来从西方流入中国的各色话语在有些方面甚至已成主流话语。一些专家学者在理论研究中一味地引进和使用西方话语，生搬硬套地解释中国的现实；西方国家利用网络技术优势把价值观输出作为核心内容，宣扬其价值观念、政治主张。他们在网络上宣扬“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普世价值”、“后现代主义”等思想观念，试图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形成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严重冲击。二是大众话语的冲击式微党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引领。在电子信息时代，“电子传播”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使得社会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人们可以在网络上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意见，形成网络空间内的大众话语，从多重角度解构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三是意识形态话语表述上的政治术语化，降低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任何政党的意识形态都要经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才能被人民群众认知和认同，这就必须考虑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传播学认为，“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①。这就说明，群众接受意识形态越费力，意识形态越难以被认同。列宁认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

^① 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了。”^①而我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过多地使用政治术语、学术话语，这大大降低了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四是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建设滞后于实践导致出现一定程度的话语困局。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功，但在总结研究成功经验、阐释宣传我们的实践方面不够给力，这使得我们仍未构建起完备的具备强大凝聚力、说服力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态度和以什么样的思路进行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已经关涉党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振兴。研究对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具有十分突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作者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学界关于意识形态建构方面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逻辑分析、历史总结和现实考察。全书由四部分内容组成。一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理论研究。这是全书的基础。作者在分析政党意识形态建构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规律。这包括，确立价值取向是建立目标体系和选择实施路径的前提，目标体系的建立以价值取向为依据并为实施路径的选择进行目标定位，选择实施路径是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的具体实现途径和手段，以上三者统一于政党自身建设的实践。在分析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总结了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逻辑。首先确立契合人民群众基本要求的价值取向，然后建立合规律性的、包容性强的目标体系，最后选择具有连续性、开放性的实施路径，在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党的先进性建设推动着意识形态建构。二是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借鉴。作者选择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作为典型，分析其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现实考察。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为依据，对照当前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现实，作者指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面临四大问题：价值取向难以满足民众不断发展的需求；目标体系的包容性受到挑战；实施路径面临路径依赖障碍；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有待提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从主观和客观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7页。

两方面分析了面临这些问题的原因。四是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选择。作者仍然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为依据，针对当前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确立契合民众要求的价值取向，包括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等；形成包容性强的目标体系，包括体现全人类利益的共产主义目标、体现国家利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体现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和祖国统一目标、体现民众利益的社会主义民生目标；通过保持实施路径与价值目标的适度张力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调整、选择张力适度的实施路径；通过不断提高党的改革创新能力、形势分析能力、理论概括能力，确保党具备适应时代潮流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研究，是一项前沿性、理论性、现实性很强的课题，不仅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而且涉及许多复杂的实际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快，人们思想文化的多元多样化特征更加明显，势必影响和制约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可以看出，作者能够以执政党思维思考和探讨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实际并提出相对应对策，是一种创新性尝试。著作资料丰富，论证合理，逻辑清晰，阐述深刻，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研究能力。其成果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为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容、依据、路径等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于巩固和加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维护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化，永葆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决策依据。

当然，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对于这一复杂的课题还有诸多需要进一步深化、具体、实证研究的地方，比如，对意识形态建构和意识形态建设的界定以及二者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说明；应进一步研究如何看待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进程及其启示，等等。期待作者能够深化对以上问题的研究。

在洪宝论文发表之际谈点儿感受，权为序！

宋福范

2016年春于中央党校

目 录

序	1
导 言	1
一、研究缘起	1
二、研究意义	3
三、文献综述	5
四、逻辑框架	22
五、研究方法	24
 第一章 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逻辑	25
一、政党意识形态及其建构的基本逻辑	25
二、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特点	52
三、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特点	63
 第二章 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价值意蕴	77
一、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功能	77
二、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时代要求	87
 第三章 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借鉴	107
一、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经验教训	107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经验教训	125

第四章 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现实考察	144
一、价值取向难以及时适应民众需求变化	144
二、目标体系的包容性受到挑战	153
三、实施路径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障碍	159
四、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不能满足时代要求	168
第五章 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选择	177
一、确立契合民众要求的价值取向	177
二、建立包容性强的目标体系	187
三、选择张力适度的实施路径	197
四、确保党具备适应时代潮流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	205
结束语：以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为起点，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215
一、积极进行党的意识形态建构	215
二、有效进行党的意识形态传播	217
三、努力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认同	219
参考文献	222
后记	236

导言

意识形态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极其复杂而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的问题之一。尽管如此，由于意识形态事关一个政治组织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其仍然是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政党作为承担一定政治任务、围绕公共权力的行使而形成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尤为密切。而对于执政党来说，由于意识形态建设在党内直接关系到凝聚党的意志，在党外直接关系着人心向背，因此就更加引人瞩目。正因如此，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尽管学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很多基本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例如，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逻辑是怎样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传播、认同之间是什么关系？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现状及问题是什么？特别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研究缘起

选择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作为研究主题，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量：

第一，基于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方法论的理论反思。执政党意识形态不仅具有维持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天然职能，而且还通过将其体现的价值诉求转化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社会意识，为政党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李普赛特认为，政治合法性的水平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状况密切相关，意识形态较高水平的一致化意味着较高水平的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

态认同，是执政党获得政治权威的根本所在，是政党夺取或维护政权的重要方式。实现意识形态认同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目的，而意识形态建构是实现认同的根本前提，是执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要求。建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对于执政党获得或保持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只有符合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执政党才能建构成功的意识形态。这就需要研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构成要素及其遵循的基本规律，把握各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第二，基于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现实反思。执政党通过建构、传播意识形态，使公众普遍认同其意识形态，为其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在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认同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很大程度上与执政党意识形态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密切相关。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是引发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困境的主要原因。从国际环境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与趋势，是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环境。全球化进程既有其客观性的一面，也有其意识形态性的一面。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不论是其模式，还是其话语都充满了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等为后盾，在全球范围内加紧推行其意识形态战略。全球化推动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执政党积极建构符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以影响本国及他国民众，也促使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积极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吸引本国民众并抵御他国意识形态的冲击；从国内环境看，我国社会变革的演进，造成经济利益和社会阶层分化，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随着社会经济成分、利益追求、分配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组织多样化的客观现实，大大增强了民众思想活动的差异性、多变性、独立性和选择性，民众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社会变革造成民众精神上的迷茫与困惑，社会关系多样化和思想观念多样化的现实使民众感到无所适从。对于我们党来说，对正处于社会变革中民众的心态和思想认识进行科学而合理的整合，并依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不仅是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严峻课题，也是现

时代一个急需解决的理论任务。

第三，基于对世界政党政治经验教训的历史反思。纵观世界上执政较长的政党，为摆脱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危机，多选择在保持基本意识形态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通过适当调整来适应变化的实际，从新的角度对原意识形态做出新的解释，即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比如，受中间阶层的扩大、科技革命兴起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了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都不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定位在左、右两个极端的位置上，而是相互向中间靠拢，力争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间阶层的利益和愿望都包容进来。只要对本党有利，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把对方的思想理论、政策主张吸收过来为己所用，而不再拘泥于一种既定的观念。也有一些执政党曾经将意识形态简单化、教条化，甚至解构自己的意识形态。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过程中土崩瓦解的。在哲学理论方面，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成为了哲学的主流思想；在经济理论方面，“市场万能”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政治理论方面，戈尔巴乔夫提出“全人类的价值”和“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要重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由于意识形态建构中的失误，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被削弱和瓦解，一个超级大国瞬间分崩离析。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敦促我们研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以避免或减少失误。

基于以上三点思考，笔者选择了“执政视域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这个课题作为博士论文及之后的研究选题，希望能够为搞清楚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理论问题略尽绵力。

二、研究意义

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重要的实践问题。探讨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和实践的

首要问题，过去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理论和现实的需要。笔者认为，深入研究执政条件下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其意义在于：

第一，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理论奠定正确的前提和根基。由于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逻辑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前提，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内容的确立、方式的选择等归根结底都是要遵循意识形态建构逻辑的。因此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逻辑实际上是支撑整个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理论大厦的基石。这就决定了对它认识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理论大厦的牢固程度。学术界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逻辑缺乏系统而科学的归纳，往往比较关注宏观层面的研究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的探讨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如果我们不能理清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理论大厦根本立不起来，即使勉强立得起来根基也不稳固。因此，正确认识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是建立整个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理论的根本前提和基础。

第二，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当前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研究，为适应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的需要，必须进行研究范式的创新。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研究，正是推进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理论体系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通过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执政党意识形态各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寻找执政党意识形态各构成要素的基本规律，形成一个基本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框架，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容、依据、路径等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许多国家的政党执政以后，在意识形态建构实践中出现以下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方面，在主观上执政党以建构其意识形态来实现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客观上执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被逐渐边缘化以至得不到公众认同进而丧失政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动机与效果背道而驰的状况，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对意识形态建构的认识发生了错误理解，对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选择出现

了偏颇。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针对执政条件下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实际需要，针对执政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通过加强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理论逻辑问题的研究，以根据实践的不断发展而重新矫正或修补、强调或弱化其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使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符合时代要求以及实践需要。

第四，有助于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指执政党意识形态所包含的理想信念、价值规范、策略目标等，能够在思想上得到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民众自觉地践行。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是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的重要保证。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靠什么来体现呢？它不是靠高深莫测的理论观点，也不是靠华丽动听的词藻，而是靠我们党提出的价值取向、理想目标、策略手段的科学性。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与时俱进的。党的意识形态在过去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并不能保证其在当前也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样地，党的意识形态在当前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也不能保证其在今后永远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所以，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必须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通过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基本逻辑的科学认识，掌握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规律，有助于实现党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化，永葆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包括对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容、动因、依据、路径等在内的研究体系。现将其综述如下：

第一，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容。学术界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内部结构及其功能等角度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容进行了阐述。

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看，主要有“两形式说”和“三形式说”。“两形式说”认为，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包括作为基本表现形式和具体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建构。理由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形式，如政治、道德、科学、宗教、文艺等，二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思想方法或思维方式；理论形态的人生观、政治观、价值观等；属于社会心理层面的情感、意志、信念等^①。“三形式说”认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包括观念化的意识形态建构、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社会心理化的意识形态建构。理由是：把党的意识形态规定为观念的意识形态，只是描述了意识形态作为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的一个方面和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环节，然而事实上，作为现实存在的意识形态，基于它对社会存在能动的反作用，不仅作为观念意识形态而存在，而且也具有社会心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形式。

从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看，主要有“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三要素说”认为，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不仅是价值理想层次的意识形态建构，而且包括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层次的意识形态建构。理由是：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价值理想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理论学说与政策主张最终都是为价值理想服务的^②。与此相类似，有学者将意识形态内在结构归结为知识要素、价值要素、实施要素三个方面。知识要素解决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是对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进行知识层面的说明，是意识形态的认识论特征。价值要素解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性。实施要素解决意识形态的“操作性”，全面表述了应该怎样贯彻政党的主张，应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采取什么样的原则、策略、途径、方式、艺术^③。“四要素说”认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即是执政

① 邱柏生：《试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

② 韩源：《意识形态发展模型研究——兼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取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

③ 张九海：《谈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非常态意识形态”》，《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党对价值取向、理想社会、批判现实、实践计划层面的意识形态建构。罗伯特·A·哈贝尔把意识形态的要素归结为四个方面，即“一套绝对化了的道德价值；努力实现这些价值的‘良好社会’的轮廓；系统批判（或如遇到与现存意识形态时则肯定它）现实社会安排，并对它们的动力进行分析；一套由当前指向未来的计划（如遇到与现实意识形态适应，则说明如何继续发展，将其建成现实系统。”^①

从意识形态的功能结构来看，主要是“三功能说”。基于对意识形态功能结构的解析，“三功能说”认为，执政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主要包括认知解释层面、价值信仰层面和目标策略层面的意识形态建构。何怀远教授把意识形态的内部要素分为认知—解释层面、价值—信仰层面、目标—策略层面^②。由不同意识形态共同构成的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在认知解释层面、价值信仰层面和目标策略层面三个功能层面上统一运作，完整地体现着意识形态的价值和作用。

第二，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动因。学术界从内因和外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角度进行了相关阐述。从内因和外因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源于执政党意识形态自身发展及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的需要；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源于执政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目标及国内外环境变化对执政党的要求。综合两个研究角度，学术界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

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是执政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需要。石本惠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执政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都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建构意识形态，形成一整套独特的话语系统、政治神话以及特殊的政治忠诚的象征符号，人为地赋予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③。这是因为，民众对于现成制度的认识，对

^① Robert. A. Haber, The End of Ideology; China. I. Waxman. The End of Ideology Debate, New York, 1969, p. 186.

^② 何怀远：《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浅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③ 石本惠：《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于政党纲领的理解，都是从执政党提供的意识形态中获得的。执政条件下，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功能就在于向民众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建构对目前统治秩序的心理和价值认同^①。

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是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的需要。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总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当时的社会存在主要就是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基于国际环境的考量，学术界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一是国际生存环境视角。任何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都要基于国际环境而生存，基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伴随始终。李慎明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②。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二是全球化视角。全球化的推进，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相互交融与激荡，这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各国的交往方式和利益格局，而且深层次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在全球化进程中，“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和坦克进攻，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③因此，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是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的客观要求。王秀阁、杨立英等持类似观点。三是信息化视角。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执政党对信息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舆论统一的局面开始瓦解。人们不再仅仅听从执政党单方面的报道和阐释，也不会盲目地追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观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要能说服人，为民众所信仰，难度越来越大。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

^① 戴焰军，李英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 页。

^② 李慎明：《中华战略文化及其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 年第 5 期。

^③ [美]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出版 1989 年版，第 141 页。

席托马斯·迈尔这么说：“现代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成员，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① 基于国内环境的考量，学术界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一是社会转型视角。大多数学者认可社会转型是意识形态转型的根本动因。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重建基于社会转型的要求。他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中共近年来提出了提高执政能力的课题。要提高中共执政能力，必须重建执政党意识形态^②。张艳新则从三个方面说明意识形态转型是社会转型的迫切要求：社会转型引发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及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党深入研究和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抵制和批判社会上存在的错误思潮和观点，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迫切需要意识形态变革与创新。二是改革开放视角。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出现了经济利益分化，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化和分层，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反映在意识形态中，就是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纷浮现出来，社会思想、思潮日益多样化。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思潮使越来越多的人产生模糊认识、思想分化，导致价值取向多元化、意识形态淡化论和意识形态多元论的出现。改革开放实践推动着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构建。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刘明君认为，当前多元文化图景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诸多挑战，导致了民众精神和信仰的迷失与危机、价值追求的冲突与漠然、文化认同的困惑与彷徨及思想信念的无中心倾向^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目标理念、理论创新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是适应党自身发展变化规律的需要。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对社会关系自觉反映的观念体系，有其自身的

^① [德] 托马斯·迈尔等：《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

^② 郑永年：《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联合早报》2007年1月24日。

^③ 刘明君：《论和谐社会建构与主流意识形态样式的转型》，《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